

# 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 11—1911. 4）\*

胡 成\*\*

（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摘要：** 1910-11年冬春东北爆发了肺鼠疫。在那个抗生素尚未发现的年代，阻止疫情最便捷、有效措施，莫过于借助国家力量，动用警察乃至军队阻断交通、消毒疫区、清扫街道、设立隔离病院等。然而，自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名义上虽属中国，实际上日、俄却在南、北满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不受中国行政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那么在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由谁行使，怎样行使检疫、防疫主权也就成为其时中、日、俄之间最具冲突性的争端。就此，以往研究只是一般性地提及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关于实际发生的大小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影响，都还值得进一步开掘和讨论。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当时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脉络之中，并试图从普通民众的感受中呈现国家权力向下伸展的实际影响。本文认为：当俄、日分别在北满、南满展开检疫、防疫之时，中国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行政理念，因反应迟缓而遭致俄、日出兵干预的威胁；面对日、俄的强大压力，中国方面将本属于内政事务的检疫、防疫，视为紧急外交事件，由外务部直接负责督办，并与俄、日之间进行了频繁外交交涉和协调；再由于主权之争迫使中国国家权必须向下伸展，检疫、防疫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简单、粗暴地扰民事件，遭到社会普遍不满和抵制。本文结论指出：在捍卫主权、防止日、俄军事干预的思维框架下，检疫、防疫过程中执法者的简单和粗暴被赋予了不得已的政治正当性。不过，普遍的自然法则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染的肺鼠疫，在人群中蔓延不受种族、领土、国家和文化的限制，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身份的政治标识，在人类经受这样一种巨大灾难时可能只具有有限意义。

**关键词：** 国家主权；国族主义；鼠疫流行；检疫、防疫；东北地区

## 一、前 言

1910年10月8日，满洲里发现首例肺鼠疫患者。作为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染的烈性传染病，由于时至寒冬，为取暖保温起见，当地多数居民家庭窗门紧闭，夜晚阖家挤在一个大炕上，缺乏基本隔离防护，疫病遂先一家一户、一街一区，后沿着东清、南满和京奉铁路向东北全境迅速蔓延。12月中旬，疫情传至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与东北毗邻的俄属西伯利亚、朝鲜乃至京、津等地面临着大规模疫病传入的死亡威胁。在那个抗生素尚未发现的年代，阻止疫情最便捷、有效措施，莫过于借助国家力量，动用警察乃至军队阻断交通、消毒疫区、清扫街道、设立隔离病院等。然而，中国历史上大疫爆发之时，官府根据财力，设立惠民药局、施棺所、安济院，免费救助染疫之人和安葬遗弃荒野的尸体，此外基本没有其他防范和干预措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香港殖民政府（1894）、天津（1902）、上海（1910）租界疫情爆发后曾动用巡警和士兵，采用近代西方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从而引发了华人的不满和社

会骚动。<sup>1</sup> 此次东北疫情爆发后，各方如何进行检疫和防疫，产生了哪些实际影响，具有什么样历史意义，是本文的基本问题。

在本国辖区进行自主检疫、防疫，是近代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就近代民族国家主权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确立东北主权可能具有独特世界史意义。作为比较，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主权初是世俗王权与教会之争，后是独立国家与外国交往时的平等权力，较多体现在外事交涉或军事意义上对领土的争夺和控制上。中国确立东北主权则与内政相重叠，主要体现在教育、卫生、商贸、路矿、司法等事务上。原因在于自 1905 年日、俄战争后，东北名义上虽属中国，实际上日、俄在南、北满划分了势力范围，并分别在大连、长春、奉天、哈尔滨、满洲里等铁路设立了附属地，不仅驻有大量军队，且还成立市政管理机构，攫取了不受中国地方行政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在此次鼠疫未爆发之前，时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就写道：东北东邻韩、日、北接强俄，铁路纵横，轮船辐辏，此时陆续开埠通商，久为各国视线所集；再以外国居留民日复加多，「民气浮嚣，动以细故争执，若非因应得宜，鲜不关乎国际。」<sup>2</sup> 此次鼠疫爆发后，俄国的铁路附属地与中国辖区犬牙相错，华人商贩、苦力等各色人等穿梭来往，为阻断华人区疫情蔓延和传入，俄、日不仅公开声称，且采取实际行动干预本属中国内政，即中国辖区的检疫、防疫。就此，锡良忧心忡忡地写道：「查疫势传染甚烈，外人尤极注意，办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机干预。」<sup>3</sup> 所以，相关演化不只是检疫、防疫怎样行使，而在于由谁行使，且还与其时各方在东北主权之争密切相关。

对此次疫情蔓延中的主权之争，以往研究早有注意。1960 年代末，美国学者 Carl F. Nathan 以「防疫和满洲政治」为题，对中国通过检疫、防疫确立东北主权进行了最初的研究。由于 Nathan 所用资料多为当时美国驻哈尔滨领事报告，虽讲述了在场旁观者的观察和印象，但当事者的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实际举措和考量，则没有太多涉及。2000 年前后，日本学者饭岛涉谈及中国、日本、俄国方面的检疫、防疫措施时，虽也涉及各方的主权之争，然其重点在卫生制度化。最近，台湾学者雷祥麟以「主权与显微镜」为题的研究，在知识/权力的层面上将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进一步凸显，对本文有颇多启发。不过，从本文的角度来看，作者主要通过显微镜观察的近代西方细菌学理论传入后的相关演化，「主权」虽作为文章的标题之一，却没有细化进行研究，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显微镜」的细菌学理论，何以会被那些不是医学专业人士的地方官接受，成为其采行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行政依据，以及「主权」与此项演化的关系，实际发生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时代特征，都还值得进一步开掘和讨论。换言之，在本文作者看来，除了知识/权力的问题脉络，还可将此案例放在帝国主义、近代民族国

---

\*本稿初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会议上报告（2006 年 8 月 11 日），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城市研究群进行报告，得到陈永发、林满红、杨翠华、邱澎生、康豹、李达嘉、张宁等先生的批评指正，并由此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惟文中错误由作者自负。

\*\*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 如 1894 年 7 月，香港华人集中居住的太平山街区爆发了腺鼠疫。为了阻止疫病向欧洲人居住区蔓延，殖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华人居住区，四周布满了哨兵，实行了戒严。同时，士兵和检疫人员逐屋检查，怀疑为感染者被送至“海之船”（Hygeia）隔离，房屋被焚毁，患者尸体被强行安葬在郊外公墓，除引发社会骚动之外，十万余华人逃离香港，进入没有采取检疫、防疫措施广州和毗邻之地。请参见“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1894,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p.159-166;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0-147;胡成,〈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读书》2003 年 6 月, 期 6, 页 115—121。

2 锡良,〈奉省办理交涉人员已届三年援案请奖折〉(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1910 年 4 月 4 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册 2, 页 1109。

3 〈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俟事竣保奖出力人员折〉(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1911 年 1 月 16 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册 2, 页 1266。

家形成的层面上进行思考。此外，Mark Gamsa最近刊发的文章论及了此次疫情爆发和以往各种解释，在方法论上批评了以往研究多从西方医生的角度出发，而很少关注疫病患者的实际经历。<sup>4</sup> 再就实际历史来看，疫病患者的经历和感受确为影响当时历史演化的一个重要面相。锡良曾写道：检疫、防疫「稍一延缓，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操之过急，群情又百端疑阻」。<sup>5</sup> 所以，对于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本文期望不只关注各方权力在制度面、措施面的所作所为，且还特别注意社会面普通民众的感受和回应。

## 一、俄、日采取的措施和直接军事干涉的威胁

自 20 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东北迅速得到现代化开发。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最快的港口、铁路中心城市，如满洲里、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不仅移入了大量俄国人、日本人，且还涌入了大量来自山东、直隶、山西的华人移民，俄国、日本和中国人早已成为疾病意义上的利害共同体。作为具体陈述：满洲里以前只是作为中东铁路终点站，与俄属西伯利亚铁路交汇，铁路区附近于 1910 年时约有 200 座俄国建筑物，平时人口为 5000 名俄国人和 2000 名华人。<sup>6</sup> 哈尔滨夏季大约有 6 万人，其中俄国人 5000 名，其余人口均来自芝罘和东北各地的苦力，其中一半聚集在中国城傅家甸。<sup>7</sup> 长春总人口约 15 万人，其中日本人 2,542 人，被划分为中国城、国际租界、日本租界和铁路附属地，及俄国铁路附属地。<sup>8</sup> 奉天约 15 万人，日本人 2,722 人，<sup>9</sup> 满铁于 1908 年在附属地中央部位修建了火车站、学校，日本居民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大部分还是居住在中国城的小西关、十间房一带。大连于 1906 年人口已达 19,064 人，其中日本人 8,371 人（约占总人口的 43.9%），华人为 10,670 人（约占总人口的 56%），是日本人居留最多的城市。<sup>10</sup> 总体上说，华人居住区卫生环境较差，被认为是此次疫情得以迅速蔓延的温床。<sup>11</sup>

---

4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飯島涉, 《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 東京, 研文出版社, 2000 年; Sean Hisang-Lin LEI,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Constitution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 Plague*(待刊稿, 感谢作者惠赐); 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 Present*, Number 190, February, 2006, pp.148-185 (此文由邱澎生先生提示, 特此表示感谢)。此外, 中国大陆的焦润明撰有《1910-1911 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 年, 期 3, 页 106—124), 试图讨论当时中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疫情采取的措施, 经验教训和社会影响。由于是文只使用了一般性的中文资料, 如《盛京时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而没有进一步搜寻档案资料和查证外文资料, 如英文版的伍连德、司徒阁等人的回忆录、奉天万国鼠疫大会的会议论文集和西方记者的现场报道, 更没有参照已有的外人研究, 如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飯島涉, 《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 故作者着力最多关于中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疫情采取的措施, 实际上是以往中国大陆之外学者已较多和充分论及的话题。

5 〈奉天民政使张元奇交涉使韩国钧请奖片〉(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 1911 年 5 月 11 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锡良遗稿·奏稿》册 2, 页 1323—1324。

6 〈满边互市开放情形〉, 《顺天时报》1911 年 8 月 25 日。

7 Dr. Bogucki, “The Plague Epidemic at Harb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Manila, 1912, pp.201-2002.

8 〈办理卫生尚未实行〉, 《盛京时报》1907 年 10 月 3 日;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n.27.1911.

9 〈东三省汇闻〉, 《盛京时报》1907 年 2 月 8 日。

10 〈大连〉、〈调查户口〉, 《盛京时报》1906 年 12 月 7 日、1907 年 12 月 24 日。

11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 旱獭忽然受到欧洲市场青睐, 价格增长数倍, 致使大批华人猎捕者蜂拥而来。在猎捕旱獭的季节(4—10 月), 满洲里人口可达 1 万, 通常三十、五十人伙聚集在临时搭盖的狭小窝棚里, 被窝下面垫着、周围堆积着血肉模糊的旱獭皮, 卫生环境极为恶劣。此外, 长春中国城街道拥挤和狭窄, 污物到处堆积, 贩卖臭烂瓜果食物及卫生有碍者, 亦不禁止, 卫生环境最差。奉天卫生环境最差的是四、五两区的工夫市一带, 贫民小贩聚集而居, 伙房小店鳞次栉比, 「湫隘器尘, 染病最易。」请参见 Ch'uan Shao Ching Dr., “Some

疫情首先在满洲里华人中蔓延。1910年9月17日，两名来自达乌里亚、受雇于俄国铁路的华工抵达满洲里，五天后，即9月22、23日相继死亡，并随后出现了更多传染病例。俄国当局随即派医生和士兵将该地华人挨次察验，三百余名看上去气色可疑之人，用火车强制转送出境，其住所由俄国士兵看守，不准其他人居住。同时，俄国当局还在海拉尔、扎兰屯、齐齐哈尔、安达布恰图等东清铁路沿线各站设立了卫生检疫站，「如有华人到站，即须检查」。<sup>12</sup> 10月27日，来自满洲里患者将疫病传至哈尔滨。当天，俄国市议会颁布检疫法，着手建立隔离观察病院，设立以俄国医生和警察组成的防疫办公室，将城市分为八个卫生区域，对进入城市的华人实行卫生检疫和卫生观察，刊行中文防疫宣传资料和组织卫生演讲。再至11月28日，又一位三天前来自满洲里的华人在俄国铁路附属区内死亡，经医生检验确系染疫毙命。当晚，租界华俄公共议事会召集防疫会议，出席者有俄国提督、东清铁路医官、巡警总办、俄国自治会议长和几位当地华董。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当局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检疫、防疫措施。翌日，为阻止华人民众随意进入，哥萨克士兵开始扼守俄国人居住区的交通要道。东清铁路也将所雇华工悉数辞退，租界内公立小学不许华童入学，「各工厂皆令华人一律散工，以免传染。」<sup>13</sup>

当传染病例在长春、奉天只有零星发现时，日本在所属南满各地就已展开了强制性的检疫、防疫。12月25日，日本着手在南满铁路沿线进行检疫，所有来自北满的旅客都要受到严格检查，疑似病人、与病患密切接触者强行送至隔离观察所。几天后，日本方面成立了防疫总部，由关东都护府总督大岛义昌挂帅，成员包括满铁总裁中村是公，满铁理事长犬塚冈松、久保田政周，关东都护府警视总长佐藤友雄，医学博士安培河西二、陆军军医宇山等。在大连市内，除民政署长吉村任命数十名日华官绅为防疫委员，与南满铁道会社联络一气，实业会、码头事务局、输出商组合等亦多次举行会议，讨论防疫办法和布置具体实施。<sup>14</sup> 再就实际执行来看，1911年1月初，大连若狭町、近江町、摄津町陆续发现华人染疫者10余人，防疫队即将患者住房焚毁，与传染源有密切接触之人一律送往隔离所。就连毗邻的龙登町、近江町、摄津町、壹岐町、若狭町、对岛町也用白铁皮围住，四面设置日本警岗，实行隔离封锁。该地的日本商人组织了共150人的义勇队，分作两班，按日从事一切防疫事务。<sup>15</sup> 此外，日本人的检疫、防疫还在长春、铁岭、辽阳、营口、安东等地展开，检验徒步、乘火车、轮船的华人，还进行了重点地区的逐屋检查、消毒和捕鼠工作。在鸭绿江一线，日本人部署了1000多名士兵，以阻止华人通过冰冻的河面进入朝鲜境内。至1月底，日本方面投入防疫、检疫的专职人员有69名医

---

Observat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Plague in Manchouli”,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Session II, April 1911, Manila*, p. 29;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an. 27, 1911; 〈工夫市拟设搜疫分所〉，《盛京时报》1911年2月17日；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911年12月刊印，编2，章3，页10；〈办理卫生尚未实行〉，《盛京时报》1907年10月3日。

12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编2，章9，页9；〈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年12月16日）期11，页344—335。

13 〈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期11，页345；〈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1911年2月12日），期12，页380；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 18-25;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页143—146。

14 日本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市内设立警戒线，派军队在重点地段防守，阻止没有通行证的华人，尤其严禁剃头匠、负贩、小商、苦力、及所谓下等人进入日本人居住区，并将大批居住城南寺儿沟的苦力集中在新设立的碧山庄苦力收容所。他们每天收工后须排队消毒，然后赶入用铁皮围住的宿舍里，四周有警卫看守，防止随意出入。此外，对举报华人鼠疫患者、患病华人、华人尸体之人，分别给予不少于200元、100日元和10元的奖励；关闭华人理发店、华人浴室、鸦片店、旧衣铺、皮毛和典当铺；禁止华人进入日本人浴室洗浴；天黑后禁止没有灯笼的华人士上街出行；禁止俄式四轮马车晚间搭载两名华人；禁止向没有医生出具死亡证明的华人出售棺木；禁止在公共场所举行中国春节的庆祝活动，等等。相关记载请参见“The Plague, Precautions at Woosung,”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an. 27, 1911; 〈旅奉日人之防疫〉、〈华工5000名之防疫〉，《顺天时报》1911年1月25日；〈北方鼠疫记〉，《申报》1911年2月5日。

15 〈日商组织防疫义勇团〉，《盛京日报》1911年1月29日。

生，29名助手，414名警察和2000名士兵。<sup>16</sup>

相比之下，中国最初反应是迟缓而低效的。当俄国人在满洲里的检疫、防疫展开后，庐滨府和交涉局地方官若无其事地目睹了俄国人将瓦罐车（即空车）改作隔离营，华人染疫者尽被驱之入内。再当哈尔滨俄国当局厉行检疫后，该地滨江关道会同俄国官员及滨江厅警务局，邀集中国城道里商会的董事，议决设立防疫事务所、临时病院和派出专职医生、巡警进行卫生检疫。<sup>17</sup>虽然地方行政制定了相应措施，实际执行却由两名来自奉天的年青医生负责。他们毕业于天津北洋医学堂，受过西式医学教育，能够调动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与之同来的护士，根本无法应对疫病日益严峻的蔓延态势。<sup>18</sup>在东北行政中枢的奉天，早在1910年11月下旬就有患者染疫身亡的传闻，当局没有重视。1911年1月2日，当首例患者被确诊之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才紧急致函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请派三名医生前来帮助防疫。接着，奉天地方行政当局在大西边门外择定地址，预备修筑收容场一所，该医院尚未告成之前，暂在北门外开设收容所。1月11日，中国方面设立防疫会，分作验病部、验菌部、捕鼠部、隔离部、病室部、消毒部等，假大西关奉天俱乐部充作公所，此时据首例病例发现已过了十多天，染疫死亡之人已达数十人。<sup>19</sup>

究其原因，或在于中国此时尚未完成制度设置和行政理念的现代转型，无法迅速采行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具体来说，前者体现为缺乏制度性的检疫、防疫机构。东北地区检疫、防疫开始于1899年7月，即香港的腺鼠疫由过往轮船传至营口，当英国医生Dr. Daly确诊了首例病例之后，该地的国际卫生检疫会以及俄国铁路属地迅速采取了相应措施，包括禁止毗邻中华人进入外国人居住区的防疫措施，中国方面则没有采取任何检疫、防疫措施。<sup>20</sup>自1905年以后，东北地方行政推行近代国家医学，招聘医生、创办医院、设置巡警，并在疫情爆发时成立专职防疫委员会，负责检疫、防疫事务。不过，当疫情结束后这些机构即被撤销。<sup>21</sup>此外，大多地方行政长官对现代检疫、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如最初负责傅家甸检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此人拥有举人头衔，操一口带有浓厚吴地口音的官话，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俄文，根本无法与俄国人直接交谈。被外务部紧急派往该地的伍连德回忆道：当

---

16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26-27.

17 〈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期11，页345。

18 具体说来，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染疫之人的报道，至12月中旬每天四至十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人。由于传染人数增加太快，专业检疫人员无法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报后，只有依靠临时雇来且没有防疫经验之人前往甄别，然后由他们将被认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离营。为了逃避警察检查和强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间将患者尸体抛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这些尸体收集起来，放在一个个簿木棺材里，埋在乱坟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则可以在没有人过问的情况下，从容运到城外安葬。临时征集来的护士、看护妇、消毒工和埋葬工，虽都到了穿戴防护服和佩戴口罩的建议，但都置若罔闻，口罩挂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因被传染而死亡。请参见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 & Sons LTD, Cambridge, 1959, pp.7-4.

19 〈瘟疫发现于省城矣〉、《汇志防疫事宜种种》，〈盛京时报〉1911年1月13日、11月29日。再如另一东北重镇的长春，中国地方行政的反应同样迟钝。1911年1月1日，北门外商埠地面伙房内染疫死者迭见数人，防疫会未采取措施。到了1月中旬，当死亡接踵而至，该商埠巡警防疫会等处才宣布戒严。时人诘问道：不知此间派赴车站检验人员所司何事，今至每日死亡十余人，「蔓延剧烈，而防疫手段尚如是，如是前途其可虑哉！」请参见〈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年1月19日。

20 此次疫情外国人死亡13人（其中6名俄国人）。中国居住区由于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据官方保守估计，死亡人数至少为1,370人，除少数肺鼠疫外，绝大多数死于腺鼠疫传染。相关记载请参见 Dr. Iasibeski, "Data Relation to the Origins of Infec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Manila, 1912, p. 217-218, p.38.

21 例如，1907年8月，盖平爆发鼠疫，8月15日成立防疫所，负责协调专职医生和巡警逐屋搜寻疑似病人，以及督促隔离消毒事宜。12月初疫情基本平息，所派委员随即撤防回奉，惟有一人驻此，留办诸务。然而，「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所设之防疫局依旧开设，往来客货仍须检验。」〈防疫所报告〉、〈鼠疫日益蔓延〉、〈防疫员之报告〉、〈鼠疫山灭〉，《盛京时报》1907年9月22日、10月11日、12月4日、12月10日。

他抵达后第二天与其见面，早上九点钟赶到县衙门时，居然还在客厅等候了半个多小时。伍连德与之交谈后的印象是：「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sup>22</sup>

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无相关国家介入检疫、防疫的行政理念。俄国、日本采取的强制性检疫、防疫措施，基于现代细菌学理论，认为鼠疫杆菌通过啮齿类动物的传染，致使人类传染者因并发性急性肺炎而死亡。中国社会此时普遍认为疫病是鬼神作祟，或个人道德亏缺所致，故检疫、防疫被相当多的地方官员作为慈善事业或个人道德行为，而非视为事关国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运作。例如，当哈尔滨检疫、防疫展开之后，俄国市政当局照会送至滨江道，希望一体出示晓谕华人，进入俄国居民区必须先往公共议事会内防疫卫生处请领执照，往来均须检验。滨江道的回复是：此事虽为防疫起见，然于商民生活颇多窒碍，当函复请从缓办，俟照会商会核复认可后而实行，可是「俄人之传单，已早发布。」不久，奉天当局紧急派往该地的官员，在与东清公司会谈时，也「以界内防疫牵累太多，焚毁房屋，禁绝行人，甚至冻死街衢，亦指为染疫，累及邻右，办法未妥，殊为文明国家之累，请即取消。」<sup>23</sup>

让中国方面感到格外担心的，是俄国、日本市政当局藉口检疫、防疫，强行要求派警察、士兵直接介入，理由是保证毗邻铁路附属地的侨民和军队的生命安全。具体来看，当哈尔滨出现疫情大规模蔓延的态势时，俄国市政当局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当局同意由俄国医生和士兵对管内进行逐屋检疫，所需一切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对此，中国担心俄国借防疫之名，乘机派兵控制傅家甸而予以拒绝，作为让步只同意俄国医生参与中国自行展开的检疫、防疫行动。尽管如此，俄国方面仍用重兵守住要道，杜绝傅家甸与俄国居民区交通，并不断派出检疫人员，不经中国地方官员允许而擅自进入中国城巡视。当然，自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在东北影响已大为削弱，此时又受到国内革命情势牵制，故谋求在华列强组织联军，共同插手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防疫、检疫事务。<sup>24</sup> 不同于俄国，此时日本人则担心其他列强军队插手检疫、防疫而削弱其在南满的影响，因而更愿意独自对中国施加压力。1911年1月，日本称与中国官方联络不便，将设立在大连的防疫总局移师至中国东北行政中枢的奉天。1月21日清晨，日本关东厅警视总长佐藤友雄、丰田技师以及委员十五人，「一律抵达奉天，先以铁路租界内日本警务署充作办公之所，开始处理防疫事务。」<sup>25</sup> 2月，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借口视察日本军队抵达大连，与此同时，负责指挥所有东北日军的大岛义昌将司令部移至奉天，表面上说是为了日本人的防疫事宜，实际上则是随时准备派军队直接插手中国方面的检疫、防疫事务。<sup>26</sup>

再让中国方面感到极大威胁的，是俄国、日本在铁路附属地驻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并在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进行了频繁调动和补充。先就俄军的动向来看，1910年秋，俄国藉口北满

---

22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1959, p.4.

23 〈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期12，页382；〈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年1月18日；甚至到了1911年2月中旬，奉天还发生了类似的中日市政当局的争执。南满铁道附属地内某屋有一位患者，经防疫事务所派人察看，回来报告说此人病虽垂危，尚能言语行动，随即日本警察赶到防疫所，请将该病人收埋，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日本警察回去报告，日警部某员亲自到该防疫所，勒令从速将患者掩埋。报载：掩埋所提调庄景高严辞驳覆，谓病人未及气断，遽即收埋，我国向无此例，于人道殊难如此狠心。「该员辞穷而退，然后向日本领事汇报，日本领事照会交涉使」。〈奉天防疫纪事〉、〈活人未便强埋〉，《申报》1911年2月21日、2月25日。

24 〈满洲里哈尔滨防疫记〉，《东方杂志》第七年，期12，页380；例如，1911年1月19日，中国方面已经开始了傅家甸的检疫、防疫，并与之进行相当合作，俄国驻华盛顿大使仍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满洲鼠疫不仅向俄国境内，而且也向欧洲和美国传播。尽管俄国当局在东清铁路范围内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阻止了疫情进一步的恶化，但在此之外的中国城疫病流行仍十分严重。中国当局的措施既不科学，也无效果。列强必须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使之对我们共同敌人采取更为有效的防范。」Imperial Russian Embassy, Washingt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Knox, Jan.19,1911,NA,158.931/64,转引自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19-21.

25 〈大连防疫总局移往奉天〉，《盛京时报》1911年1月27日。

26 Consul-General Fisher's dispatch NO. 62 from Mukden, Feb. 19, 1911, p.3, NA. 158.931/137, 转引自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31-32.

匪患猖獗，损害商业，派员察看沿线地形，并往东清铁路各站增派了数千名士兵。当疫情爆发后，俄国藉词防疫，再添兵队至东清路护军。然而，这批部队久届换防之期，然「换防之军已到而旧军犹未撤回。」<sup>27</sup> 再就日军的行踪而言，当疫病传播至长春以南之后，日本当局派出多名侦探至辽阳、锦州、新民、凤凰城等处进行调查，举凡中国军民多寡、扼塞远近，土地肥脊，物产名色，随时登记，「若遇中国巡警追诘，则藉口游历或藉口调查鼠疫，以支搪塞云。」<sup>28</sup> 至1911年2月，日本当局沿铁路紧急建立了二十多处隔离营，每处可收容一千至三千人不等。虽则，日本人宣称这些设施将作防疫之用，却一直空置在那里。日本陆军第十一师团从广岛调到南满，以换防驻扎该地的第五师团，但换防部署完成之后，第五师团却没有离开的意思。2月12日，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以统筹安排防疫事宜为名秘密抵达奉天，寓居日领事署内，两天后（14日）又赴长春、铁岭等铁路附属地进行军事部署。此时日本在南满除警察之外，军队已达八个师团，并准备再调两个师团。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表面上则名为防疫起见，实则命意别有所在也。」<sup>29</sup>

## 二、被作为紧急外交事件的检疫、防疫策略

有日、俄在旁虎视眈眈，中国方面自然不敢将检疫、防疫视为一般的公共卫生事务，而将之作为关系国家主权的外交事件，小心翼翼地予以处理。1911年1月中旬，由于担心东北疫情沿着京奉铁路传入京津，驻北京外国使团议定阻断使馆区的交通、增加守卫士兵和进行信件、物品消毒等各项预防措施。21日，北京外交使团因中国官方防疫不力，颁布法令严禁华人进入使馆内区，致使清廷急忙谕饬民政部、邮传部、外务部切实进行京畿地区的防疫。民政部随即在前门车站地方及京奉火车严行消毒之法，并札饬内外城警厅传知商铺住房等务将各寓内鼠穴堵塞，凡捉活鼠1只，给铜元2枚，毙者给铜元1枚。各警察局也传谕各旅店、客栈，凡有就寓客人必须登记，查问从何处来京，是否有病，详细呈报，以便查察。<sup>30</sup> 就此，中国舆论评论道：「外兵压境，鼠疫燎原，财力困穷，百废待举，呜呼！满洲之天灾人祸，宁有已耶。满洲之交涉败而祸及全国，满洲之疫病而震动全国，此又岂特满洲而已耶。」<sup>31</sup>

东北作为疫传染源头，检疫、防疫直接由外务部，而非由民政部督办。1910年12月20日，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紧急电召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21日，伍连德趁最早一班火车前往北京，十一点钟到达前门车站时，施右丞的私人轿车已等候多时。接站之人递上一张施肇基手写的英文便条，让伍连德立即前往其在城北的宅第。差不多下午时分，伍连德到达施右丞的官邸，受到礼貌接待。简短的寒暄之后，伍连德得知将被派往哈尔滨，全面负责该地的检疫、防疫事务。让伍连德感受最深的是，施肇基谈及满洲疫情的严重性，除众多民众死亡，财产巨大损失之外，更担心俄国和日本当局的威胁。施肇基的估计是：除非中国采取严厉

---

27 〈俄人调兵增戍〉，《时报》1911年2月18日。1911年2月，来自俄国在东北后方补给基地满洲里的报道称，该地停车场堆积的军用品不计其数，以往俄国从满洲里站往东北方向发送的兵车，日不过三四十瓦罐（装兵车名），且断续无常，自1月中旬起均用双车头拉送，后挂列车延长里许，悉载俄国士兵。此外，俄国军用列车到站起卸，皆以夜间运来军装枪械，并以货车作为伪装。兵车至站，兵士下车者，不准远离，四面均由宪兵队围守，如赴前敌，致使该地「商民惶恐，俱不识其用心何在。」请参见〈要闻〉、〈俄人五路进兵〉，《时报》1911年2月20日、3月27日。

28 〈到处调查〉，《时报》1911年3月9日。

29 〈日兵十师团〉，《时报》1911年3月9日；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26-32.; 从现有资料来看，日本方面确有这样的考虑，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说：对于检疫、防疫，日本不管清国的意向如何，一定要用以实力为基础的强硬手段。如果日本采取强硬措施的话，不仅在奉天，其他地方也会出现骚动。“因此，我们要做好这样的精神准备。”转引自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国》，页196。

30 〈满洲疫患南渐续闻〉，《申报》1911年1月24日。

31 〈满洲之天灾人祸〉，《时报》1911年2月17日。

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外交事件。<sup>32</sup> 再至 1911 年 2 月中旬，由于哈尔滨等沿松花江居住的民众为逃避检疫，将患者尸体抛弃冰冻河面之上，俄国除派出一队骑兵，沿着松花江巡逻之外，还准备在江河开冻之际设立检查站。外务部得知此信息后，致电锡良，云：此事关系主权，俄国显欲侵越，请电飭地方当局派遣马队梭巡，并速将呼兰河积尸火化掩埋和制止民众继续抛弃尸体。开冻之后，中国须在松花江、黑龙江的中国境内，实行防疫检验章程，「现时务须派医员扼要自行赶办，毋令其藉词干涉。」<sup>33</sup>

哈尔滨和奉天是北满、南满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人侨民居住，且俄、日铁路附属地与中国市政重叠，检疫、防疫更具主权象征意义。哈尔滨的检疫、防疫由伍连德负责。12 月 24 日清晨，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经过几天的流行病学调查之后，确定此次疫情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肺鼠疫，并将防疫计划报告外务部。<sup>34</sup> 至于这些措施的具体落实，用一位现场采访的西方记者的话说：不少房屋被拆除、焚毁和消毒，「每个人每天都要经受检查，整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隔离检疫营。」<sup>35</sup> 奉天的检疫、防疫则由锡良直接负责。锡良谢绝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医生为防疫总负责，聘请与之私交甚好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Dugald Christie)作为总顾问，全权负责整个城市的检疫、防疫事务。司徒阁的同僚，曾在热带非洲长期工作过的 Dr. Alexander Young，以及对东方疾病有丰富治疗经验的 Dr. Jackson 和另外七名日本医生也被聘为顾问。锡良还批准成立了由地方官员、交涉司、巡警和官医院负责人组成的奉天防疫局，城外一座空庙、六个孤立院落被分别辟为临时隔离病院和与鼠疫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营。整个城市分成七个区，每个区交由受过西式教育的华人医生负责，配有警察、检疫人员、脚夫和隔离观察病院。<sup>36</sup> 再用一位现场采访的西方记者的话说：司徒阁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绝对信任，「不管代价如何，他的每一个提议都得到贯彻。」<sup>37</sup>

为向列强宣示厉行检疫、防疫的决心，中国官方将大量堆积染疫者的尸体公开火化。其时，各地染疫死亡人数剧增，有些民众为了逃避检疫和送进隔离病院，经常将同居之人的尸体抛弃在街上（在哈尔滨则抛弃在松花江的冰上）。<sup>38</sup> 各地防疫局虽组织了掩埋队，专门搜集夜里被抛弃到街上和四野里的尸体，但在东北的寒冷冬天，冰冻数尺，挖掘坟坑十分困难，很多薄皮棺材和裸露尸体散落在坑里，棺材有的盖钉牢，有的则敞开，伸出死者的胳膊和腿，旁边犬迹错杂，鸟鹊飞舞，惨不忍睹。<sup>39</sup> 就此，外人报纸刊登多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城中弃之于

---

32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p.279-280.

33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17,1911; 〈外人干涉防疫种种〉，《申报》1911 年 2 月 18 日；〈北疫报告〉，《时报》1911 年 2 月 20 日。其时，锡良多次致电哈尔滨华界地方长官滨江道，令其采取有效措施，勿使俄国再次藉口越界干预。滨江道接到此电令之后，即传飭哈尔滨防疫委员姚某等到署，严厉「申斥办理不善，诚难辞咎。」不久，锡良因哈尔滨疫情继续盛行，频遭外人抗议，派新任吉林交涉使郭宗熙亲赴哈尔滨督飭防疫，认真督察检疫、防疫事宜，以设法避免外人干预。再由于锡良因担心日、俄两国藉口防疫，干预东三省内政，多次上奏清廷，乞退甚力。请参见〈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 年 1 月 18 日；〈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1911 年 1 月 26 日；〈专电——初三日亥刻北京专电〉，《时报》1911 年 2 月 2 日。

34 1911 年 1 月初，从各地征召的医生和从长春调来的陆军 1100 名士兵抵达后，伍连德随即召集了防疫会议，议定将傅家甸分为四个卫生区，居民必须在右臂佩戴规定的袖标，四个区有白、红、黄、蓝四种颜色。佩戴各区颜色袖标的民众只能在自己的区里活动，如果要到另外一个区，必须提出申请，以得到特别许可。城内各要害地段有 600 名警察执勤（城内人口 24,000 人，每 40 人中有 1 名警察），每区设置 1 名资深主管医官，配备 2 名助手、4 名大学生、58 名勤务人员（消毒工、房屋检查人员、担架夫、救护夫、联络人、车夫和埋葬工）和 26 名警察，并配有 112 辆大车和 16 副担架，用来运送病人和与之密切接触、需要隔离进行医学观察者。城外交通则由新抵达的 1,200 名士兵看守，没有防疫处的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城。请参见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p.11- 25.

35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7.1911.

36 Inglis Christie,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 the Story of a Life with a Purpose*, by his wife; with forward by Sao-Ke Alfred Sze, London : James Clarke & Company, Ltd.,1932, p.129-130;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 31-32.

37 "An Awakening,"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an.27.1911.

38 〈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 年 1 月 18 日。

39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 p.28.

街心的累累尸体，及其任由野犬吞食，华人民众和站岗巡警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境况。<sup>40</sup> 就华人乱抛尸体之事，除俄国派兵巡逻松花江，严加查禁外，日本也向外务部进行了交涉，造成不小的外交压力。<sup>41</sup> 1911年1月底，外务部致电伍连德，同意将收集的尸体进行火化处理。<sup>42</sup> 1月29日，在伍连德的亲自指挥下，200名工人将尸体分成22堆，每堆100具。次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下午2点，火化作业正式开始。俄国当局的代表，包括代理领事和东清铁路资深防疫医生Dr. Butberg抵达了现场观看。一个步兵警备队在四周守卫，并负责往火上添加火油。防疫局发出传单，号召民众燃放爆竹，驱邪接运，为死者送行，全城一时烈焰腾空，硝烟弥漫。<sup>43</sup>

清廷加派军队前往疫区，名义上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实际上也有宣示主权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早在1911年1月24日，驻守长春的陆军第三镇1160名士兵被紧急调往傅家甸，以预防俄国军队介入。<sup>44</sup> 再当各国公使致函外务部，称山海关的防疫事务过于疏懈，准备各国分派兵队前往，并称如有不服拦阻，欲强行入关者，即行开枪。外务部恐肇事端，急忙进行交涉，商定由陆军部派兵前往守卫。2月初，陆军部令驻永平府步队一协内调派一营两队共720名士兵，剋日开拔，在山海关设岗守卫，并由外国医生负责检疫南下旅客和步行入关之人。该局章程规定凡入关旅客，无论中外上下之人，除一律检查之外，还要在该检查所滞留五日，医生验明确实无疫，始准放行。不久，外务部接到北京外交使团照会，称：山海关检疫不论中外，殊于外人行旅不便，请飭该局嗣后通融办理外人检疫。外务部总办屈永秋回函道：鼠疫传染，不分中外，若外国人可通融办理，难保疫气不转发生，且各国通例，凡疫症发生之处，所有往来孔道，不论何国人士均须一律照章检查，从无对外人可以通融之理。检查不能独宽外人，「此乃万国防疫通例」。<sup>45</sup>

由于中外间的互不信任，在检疫、防疫过程中难免引发彼此冲突和对抗。据日本背景的《辽东新报》报道，抚顺日人为阻遏鼠疫，在日本居民区与华界接壤处设岗，由日本防火队值班监视。1911年3月14日，有一华人欲进入租界，被哨兵阻止，彼此理论。中国巡警计三十余名，各持枪械，一哄来袭，将哨兵神谷茂三郎刺毙，岗亭和隔断线也被肆意破坏。旅抚日侨民闻讯大愤，请日巡官等前往中方巡警局，致使冲突又起，华警一名受伤身亡，双方负轻伤者计数名。第二天，日本警务署长佐佐木由奉天起程，前往抚顺实地调查。不过，中国官方文件称：中国巡警为防疫阻断了交通，一位日本居留民坚欲通过被阻而不服，恃强殴打中国警察及苦工，致使群相互殴。除日本人死亡一名之外，也有一名中国警兵被日居留民击毙。事发后，中国方面派员进行调查，并将之照会日本领事。日本方面则称中国警察为难日人，有意起衅。此后，双

40 〈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年1月18日；〈俄人调查傅家甸之悲观〉，《盛京时报》1911年1月19日。

41 〈日使为东省防疫事谒外部〉，《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

42 外务部的训令是：「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伤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请参见〈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10日。

43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28; 就在哈尔滨展开焚烧行动的当天，锡良致电吉、黑两省巡抚，命以同样方式处理堆积尸体。2月初，长春火化了各地收集而来1600余具尸体。2月12日，该地又将400余具尸体堆积焚烧。据防疫人员说，「火葬及掩埋的疫死者不下二千五百名」。接着，双城也将200余具尸体「浇上煤油，用火焚化」。请参见〈疫毙者几有不胜火葬之势〉、〈焚化尸身〉、〈尸身不及掩埋〉，《盛京时报》1911年2月16日、2月17日、2月18日。

44 〈奉调军队前往哈尔滨办理防疫事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兵部一陆军部档案，索卷号531—15—3，案卷号第285号；1月中旬，长春一带马贼猖獗，外间谣传有将焚毁官署，袭击富室之风说，日本人居留该地者大为紧张，派遣士兵设置警戒线，严禁华人出入南满铁道附属地内，报载：「锡督为思患预防，计恐原驻长春之陆军兵力太薄，特派第二十镇兵队前往镇压。」2月初，日本严密调查满洲户口，「立意叵测，大势危急，陆军部谕飭第一镇至第八镇各军队预备调遣边防。」请参见〈北方防疫汇纪〉，《申报》1911年1月19日；〈陆军部奏派兵队赴奉防疫〉，《时报》1911年2月20日；〈要电一一廿三日亥刻北京专电〉，《时报》1911年2月22日；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9.

45 〈奉调军队前往哈尔滨办理防疫事务（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1月24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兵部一陆军部档案，索卷号531—15—3，案卷号第285号；〈北京防疫记〉，《申报》1911年2月3日。

方迭次晤商，日本方面坚持要求道歉和赔偿。<sup>46</sup> 当然，中国最担心发生类似义和团的排外事件，因为各地谣言蜂起，称日本人为了独霸东北，雇佣汉奸，在数百口水井中下了毒，致使疫病四处蔓延。为了安定人心，奉天巡警局迅速抓获被称为制造谣言的嫌犯，将其证词广而告之，云：该人因诈骗而被巡警查获，恐诈骗卖芝麻罪发，信口妄供，并无往井里撒药之事。<sup>47</sup>

对于检疫、防疫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处于弱势的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磋商予以解决，而非付诸于实力对抗。典型的事例如 1911 年 1 月中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前往交涉司衙门，要求时任奉天交涉使的韩国钧同意由日本方面派日本医生、警察，对日人居住地附近的华人进行按户检查。韩国钧以主权攸关，婉言拒绝。小池张造坚持自己的立场，韩国钧遂于是日晚间复往该领署「再四央恳，暂缓察验。」第二天，小池张造联络驻奉各国领事公同照会交涉司，让其转告锡良，云：现在瘟疫日炽，各国驻奉之人过多，恐有传染，请督署速派警员防范，以免蔓延。如贵国没有防范之人，各国将自行组织防疫。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闻锡督当飭各司使作速派人预防，一面照覆各领事，请勿越俎代谋。」<sup>48</sup> 一周之后，小池张造再次约见总督，坚称检疫、防疫必须由日本警察参加和监督，逐屋搜寻染疫患者。锡良则强调了居住在铁路附属区内中国居民的管理权属于中国，日本警察无权越界干涉。<sup>49</sup> 至 2 月 11 日，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与锡良会面，双方就防疫问题进行磋商。日本提出了组织日清共同防疫委员会的设想，共同商讨奉天等地的检疫、防疫行动。据说，锡良略无异词，答复道：「惟须俟具奏允准后，方能遵办。」<sup>50</sup>

### 三、国家权力向下伸展与社会各阶层的抵制

在与日、俄的严峻对峙中，中国在东北主权不只是外交交涉和磋商，且还体现为国家权力通过检疫、防疫向下伸展，并在地方基层切实有效地运作起来。先就权力向下伸展而言，1911 年 1 月初，各地纷纷设立防疫局，配备人数不等的专职防疫人员、巡警、士兵和夫役。<sup>51</sup> 后来随着疫情加剧，一些地区防疫所还招募了新的防疫人员。开原警务局原有 30 人规模的警卫马队，因办理防疫，不敷分布，出示添招 20 名 20-30 岁的人员，「粗通文字者为合格，飭令自备鞍马，

46 〈抚顺中日巡警互哄警闻〉，转引自《盛京时报》1911 年 3 月 14 日；〈谨将本司交涉未了各案开具节略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缩微胶片第 109 卷，第 584 号。

47 〈撒药役人之供词〉，《时报》1911 年 2 月 4 日；东北地方当局还以锡良名义颁发告示，称：「外国商人在奉与中国民众同此食息，决无投毒药害人自害之事」。北京政府民政部也颁发告示，说：奉省疫病流行，外人不乏殚精竭虑，献出宝贵生命者，「法国医生梅尼、奉天英国医生嘉克逊、新民府日本医生守川皆系我国聘请办理防疫事务，因染疫而死，即哈尔滨一带俄人亦多疫毙」。请参见〈东督禁止谣言〉，《时报》1911 年 2 月 4 日、10 日；〈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 年 2 月 10 日；“*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17,1911; 〈谣言宜禁〉，《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23 日；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9.

48 〈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申报》1911 年 1 月 26 日。

49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31-33.

50 〈大岛爵帅晋谒锡督纪闻〉、〈中日两国协同防疫之意见〉，《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14 日、2 月 17 日。此事的后续发展是清廷批准成立中日共同防疫委员会。从 2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该委员会共召开过八次会议。日方先将此会议设计为一个共同防疫的权力机构，中方则担心日本的乘机干涉，只将会议的性质限定为双方磋商的平台。实际上，当中方得知美国担心日、俄在东北的行动可能破坏其标榜的「门户开放」政策，也还向美国公使请求派遣专家来华，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影响，以阻止日、俄可能进行的军事介入。请参见飯島涉，《ベー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頁 193—194。

51 例如奉天防疫局下属八个检疫分所，每个检疫分所一般包括 2 名总办委派的专职检疫员、1 名地方巡官轮换的巡警、1 名陆军排长和 10 名兵士，及雇佣的 4 名杂役。每个检疫所有办公地点，配有方桌、方凳、煤炉、门灯、桌灯、喷筒等办公用具，每日消耗一斤煤油、30 斤煤灰。委员每月伙食费 12 元，津贴 18 元，杂役每名每月伙食费 8 元，陆军排长每月伙食费 12 元，兵士每月伙食费 9 元。此外，检疫分所下设隔离所，规模小的只有 20—30 间房屋，规模大的有 60—70 间房屋，分别为男女隔离室、休息室、消毒室、病人饭厅、医官看护室、夫役室、所长办公室、管理员饭堂、库房、巡警住室等。请参见〈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修改八关检疫分所暂行规则〉、〈东关隔离所〉、〈南关隔离所〉、〈东关隔离所〉、〈北关隔离所〉、〈西关暂设隔离所〉，《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14 日、2 月 20 日。

自具铺保，赴局报名，以应挑选」。<sup>52</sup> 再就地方基层有效运作来看，1911年2月初，锡良因检疫、防疫不力，解除了包括长春道台、哈尔滨道在内的一些的地方官员。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写道：由于此次疫事起于仓卒（猝），几于措手不及。地方印委，既苦事无艰难，又鉴于传染危险，群有戒心，「故将办事不力及稍形畏缩者，先后撤参数员，俾任事者视同义举，各具拯民水火之心。」<sup>53</sup> 同样，各地对行政官员中的违规者和渎职者进行了查处。傅家店规定不准娼寮接客，滨江厅某科员却与妓女一起饮酒作乐，被发现后撤革，「并枷号游街二日」。辽阳交通虽被阻断，运粮米车辆却由北屯运载入城，警务长以沿途巡警遗漏检验，「当将该处巡官巡长一律撤差」。<sup>54</sup>

作为尚未经过现代转型的旧体制，各地方官府都缺乏相应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有太多简单和粗暴。例如，营口防疫局聘请了3名日本军医和2名医师，并配属了60名巡警的检疫队和24人的消毒组。为了防止疫情传播，该地设有3处贫民留养所，「所有本埠乞丐、贫民概经各警区派警巡查，见即抓送入所，以免街市污秽熏人，易于传疾。故日来街市乞丐之迹已继绝矣」。<sup>55</sup> 更简单的处理则是在奉天和辽阳，前者「以收容无数贫民，事属难办，决计将贫民给棉衣一领，驱逐出城，分往四乡」；后者临时防疫事务所检疫人员，每日协同巡警认真检查，「查此疫之发生多出于下等社会，故昨经警局严飭，各所务将各管界小店伙所住苦力，概行驱逐出境」。<sup>56</sup> 再至1911年1月中旬，当长春检疫、防疫展开之后，当局为减少传染，将大北门、马号门一带及商埠各处，将所有小店伙房一律查封，2000多旅居贫民被强行放逐十里堡，「昨天蜂拥鱼贯，吵嚷喧闹，相与南下云」。更为荒唐的是该市人防疫总局以妇女身多不洁，易于传染为由，向地方官提出派人分赴四乡，租赁五百间民房，将城中妇女一律迁至乡屯，以期隔除疫毒。地方官员闻之颇为犹豫，「嗣与何子璋太守会商，闻此议已作罢」。<sup>57</sup>

再由于各地检疫人员多是临时抽调和征募的巡警、士兵和街头平民，难免执法随意或公报私仇。如逐屋检疫、查找染疫患者的检疫人员，很多人没有相关专业背景，有些还是目不识丁之人，根本无法准确判断那些面带病容的被检查者是染上了鼠疫，抑或患有其他疾病，致使不少人被误定为染疫者而被强行隔离。奉天二区界内某居民原有夙疾，被检疫人员指为染疫，必欲拘送病院。据说其母年七十余，谓往必死无幸，不忍分离，「竟先自投井而死，该队不顾，仍拘而去。」奉天陆军某部一伙夫偶患寒病，类似疫症，被检疫员查觉，送交检疫所。喝了医员的药水之后，该伙夫迷糊不醒，随即殁以薄棺付埋葬队。甫至野次，掘挖未毕，棺中之人已跃然起立，埋葬队骇不敢向前，「该伙夫迳直驰往警署叫冤，未几即回原部队」。<sup>58</sup> 检疫、防疫过程中还不乏公报私仇者。吉林西关九区分所某居民，从家出来后遇到查疫者，遽以验疫问该人。该人忿未回答，查疫者即带防疫队数名，前往谓其患疫不报，竟扭至诊所，「其家人悉行隔离，

52 〈添募警卫马队〉、〈录取者售洋之奇闻〉，《盛京时报》2月24日、3月5日。

53 〈奉省防疫出力人员择优请奖折〉（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1911年5月11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册2，页1321；“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17, 1911.

54 〈严惩治游委员〉、〈警务长注意防疫〉，《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15日。这种自上而下的严厉督察，确实使当时拖沓懈怠的政坛出现了某种新气象。例如，1911年1月中旬，奉天普降大雪，各区幽僻街巷多有堆积冰雪，于卫生上大有妨碍，巡警局长特飭各区区官各办大车数十辆，雇佣苦工二十名，「派警带领清理街巷，扫除秽物，以重卫生」。辽阳等地的警务长晚上九点钟「带同马巡警数人暗查各属防疫巡警是否得力」。请参见〈各区清理街道〉、〈警长慎重交通〉，《盛京时报》1911年1月21日、2月16日。

55 〈防疫片片录〉、〈防疫片片录〉、〈日员村田君之鼠疫谈〉，《盛京时报》1911年2月11日、2月14日、3月22日。

56 〈奉天防疫〉，《顺天时报》1911年2月25日；〈严防时疫驱逐苦力〉，《盛京时报》1911年1月20日。

57 〈放逐贫民南下〉、〈妇女儿有生别离之惨〉，《盛京日报》1911年1月28日、3月3日。

58 〈陆军伙夫险遭活埋〉，《申报》1911年2月14日；这大概不是个别现象，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一名年逾五旬的苦力，素有痰疾，因天气严寒，旧病复发，横睡榻上，防疫人员疑为鼠疫，拖起洒以石灰炭酸水，该苦力惊骇之余，状几欲死，防疫人员即令抬埋，行至半途，搁地休息，该苦力渐次醒活，「幸棺木系薄板造成，猛力将棺木蹬坏，钻出飞跑，掩埋夫数人追之不及，回报检疫所，反曰该苦力游尸而逃」。请参见〈北方防疫汇纪〉，《申报》1911年2月14日、2月19日。

倘使某甲缘此毙命，岂亦可谓之死于疫乎？」<sup>59</sup> 此外，处于僻野的隔离所不时发生野狼深夜进院觅食病人之事，看护巡警以枪击之，狼不稍畏，「由是言之，该所病人不死于百斯笃，必死于狼矣。」当然，被强行送进隔离所之人不能逃跑，因为隔离所巡警的枪枝一律装弹，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sup>60</sup>

腐败贪污之事也时有发生，且非个别或偶然现象。对此，当时新闻报道多有披露：在傅家甸的检疫、防疫过程中，俄国医生随同防疫队及通事挨户稽查，时有藉端勒索之事，不遂所欲，种种苛求，指其室宇不洁，必逼令迁出而后已。「闻各通事已索诈钱文不少，俄医及俄兵亦得分其润云。」<sup>61</sup> 1911年1月下旬，清廷拨付了13万元的防疫经费，锡良将之分给各地。吉林巡抚得到4万，其中8千分给了当时尚未解职的长春道。这位长春道却没有将之用在检疫、防疫上。一天，他听说吉林巡抚要来视察检疫，为遮掩耳目，急忙向日本人借医院和医师，遭到拒绝。情急之际，他征用了一所民房，标曰医院，雇乞丐130人，扮作病人，充实其中，四周用巡警数人，著白色检疫衣，伪装为监守。吉林巡抚到场巡视一周，竟未觉察，后来此事被日本《朝日新闻》披露。<sup>62</sup> 有的地方防疫队员按户清查之时，「至各住户窥看妇女，任意滋闹，以致乡民怨声载道，反对检验」。<sup>63</sup> 尽管，当时没有具体统计数字表明发生了多少此类勒索、瞒报、造假、扰民事件，但当时在场西方新闻记者的印象是：中国高层期望能够有所作为，令人失望的是其下属们阳奉阴违，高层政令往往不能得到认真执行和贯彻。<sup>64</sup>

虽则，强制性检疫、防疫一定程度阻断了疫病扩散通道，但对于病患和与之密切接触者，不啻经历了比病患更难忍受的折磨和惊吓。时人说：此次疫病的救治，不特华医毫无见地，即西医亦未有十分经验。被隔离之人往往住所三、二日，始得释放，而所中居处，「系一庐棚，下铺竹篾，篾下积雪未融，朔风凛烈，男妇老幼，杂卧篾上，所携背包衣箱，尽携去消毒，无复御寒之具，不病死未几冻死，至医生检疫匆忙，草草了事。」<sup>65</sup> 对此，政治、文化精英们也承认：防疫之行政，性质属于慈善，而其运用之手段，则有时若出于至很毒者，否则，不足以达其保全未罹疫者之目的也。是故，检查之严厉，涉骚扰者也；隔离所之收容，涉于苛刻者也，遮断徒行者之南下，尤涉于琐碎酷虐，「而易招非议者也；而不得不实行之。」<sup>66</sup> 在场西方新闻记者的批评则一针见血，云：大多数执法者像野蛮人一样（barbarous），执法时常常不问原因，也不区分必要和非必要。最常见的是，多数无辜的病人就像应受惩罚的罪犯、乞丐，饱受折磨和处于焦虑之中，这都被冠以「为了公众的福祉！」（for the public good!）<sup>67</sup>

再就社会的反应来看，尽管这是为了阻止疫情继续蔓延，或者干脆说是捍卫国家主权而避

59 〈以查疫员竟以疫诬人耶〉，《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

60 〈隔离所进狼〉、〈隔离所之戒严〉，《盛京时报》1911年2月24日、1月19日。

61 〈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年1月18日；此外，该地巡警局每日虚报死人数目三五十名，每日可多由棺木中领出钱二三百元，时人说：「专筹杂务之钟委员日前购买木材一百五十古巴（立方），竟以一百古巴作为一百五十古巴，现在木材价大涨，每古巴三十余元，一次竟入自己私囊一千五百余元之多。」请参见〈办理防疫官员肥己〉，《盛京时报》1911年2月18日。

62 〈北方防疫汇纪〉，《申报》1911年2月19日；再如开原一澡塘因检疫而停业，业主担心亏损，特托一位官员向检疫人员说情。检疫人员同意通融处理，条件是须购买每箱合日洋百元的石炭酸二箱，以及每架合日洋三元喷雾器三架。然而，石炭酸每箱市价不过小洋四、五十元，「喷雾器则可以免费提供」。请参见〈医员之无耻〉，《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

63 〈防疫队假公济私〉，《盛京时报》1911年3月4日。

64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r.10,1911.

65 〈扑灭中国北方之瘟疫〉，《东方杂志》卷8（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1911年10月16日），号8，页7；再如奉天小西边门外防疫所，报载房屋空敞，没有暖炉，所有病人悉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既不准用，以防毒患；且饮食不足，雇佣夫役，亦不留意扶持，被隔离之人往往困苦生愁，因愁生病。由于医官怕被传染，并不认真医治病人，仅以药水淋洒，致使「死亡相继，厥状甚惨」。请参见〈防疫所果有缺点欤〉，《盛京时报》1911年1月26日。

66 〈防疫赘言〉，《盛京时报》1911年1月27日。

67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17,1911.

免日、俄军事介入的不得已之举，但对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严重破坏确也引发了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不服从、不合作乃至反抗事件。首先，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传教势力就不理会中国官府的检疫、防疫措施。当傅家甸的检疫、防疫展开之后，该地法国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聚集大约 300 名年龄不同的男女，照常进行日常宗教活动，致使疫病在这部分人群中的大肆蔓延。当罹染疫病者被发现之后，法国传教士们没有将患者送进隔离病院，而是让自己的大夫进行治疗，染死亡者的尸体被偷偷运走，乘夜色掩埋，该教会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0 名教会成员中死亡 243 人，其中包括法国和中国主教。<sup>68</sup> 此外，不少穆斯林虽然没有外国传教势力的宗教特权，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也希望自行检疫、防疫，以免将染疫信徒送到汉人的隔离病院。1911 年 2 月中旬，铁岭回民社会向警察局具禀立案，提出自行设立隔离病院。当局担心此举「反致传染，不谁所请，该回民坚执甚力」。<sup>69</sup>

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商人，要求自主进行检疫、防疫。最初，商人们积极参与了各地官方主持的防疫、检疫事务，如 1911 年 1 月 18 日，奉天城乡地方自治会、农务会、商务总会及报馆等代表集议防疫办法。长春防疫事务也由中、日两国当局与商界会议，决定联络一气，协同办理，中国方面还以农产公司总办为防疫委员长。<sup>70</sup> 然而，随着检疫、防疫的展开，交通阻断、市场萧条、银根缩紧、以及商铺被强行消毒和关闭，商人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遂指责官府防疫部门的无能和腐败，并要求自行实施检疫、防疫。<sup>71</sup> 再如公主岭地方官员为了阻遏疫情蔓延，决定断绝了交通，派巡警严守各交通要道，禁止车辆通行，致使中、日粮商等受累不浅。至 1911 年 2 月下旬，商人们议决成立各商同盟，对于该官宪虽一粒米、一片肉决不卖给，以图抵制，「且隔离所已由该会商办，其余一切防疫事宜，不容该地防疫委员置喙」。<sup>72</sup>

---

68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p.14-15;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36,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y 6, 1911; 挑战中国官府检疫、防疫权威的还有部分华人教民，如疫情在昌图猖獗之时，铁岭防疫分局派员前往查验，搜埋弃尸，隔断交通，教民刘某出面阻挠，肆口漫骂，指责消毒人员强行抢夺，该屯公会将之缚送府署，「答责一百释放」。开原某村教民高某家中有染疫死亡者，铁岭山头堡防疫分所查知之后，随即派员前往消毒，「该教不允，并即率众行殴，该所消毒队见众寡不敌，即回城禀明县尊」。请参见〈教民阻挠防疫汇志〉，《盛京时报》1911 年 3 月 15 日。

69 〈回民自设病院不准〉，1911 年 2 月 23 日；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开原，该地百余户回民，由于防疫禁绝交通，生活出现困难，再加上看到被防疫所认定的病人抬送隔离病院之后，死者十之八九，且不准亲人往视，热心人士遂筹款自设防疫会，并在各处遍贴告白，曰：回民中生活无告者，均可赴该会陈述，申请经济补助，量与救济。教中男女染疫者，由该会自行料理，「以免送入隔离病院，致饮食不便，有违教规」。请参见《回教创设防疫会》、〈回教徒之慈善会〉，《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23 日、2 月 24 日。

70 〈满洲鼠疫记〉，《申报》1911 年 1 月 21 日；此外，奉天商会每月承诺为防疫委员会提供 1 万两银子的财政支持。不仅在奉天，如双城地方官为防疫经费无从筹拨，向绅商各当募资，「当集得市钱一万余缗，再从税款中提拨市钱二万缗，以充防疫经费」。长春商会发动各商铺为地方检疫、防疫经费筹集资金，「约四百余家，共捐款两千元」。请参见“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Jun.27.1911; 〈防疫经费有着〉、〈商户投资于防疫事业之踊跃〉，《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17 日、3 月 5 日。

71 具体情形是奉天总商会派出人员，发给自治防疫员证牌一方，按日轮流协同巡警，挨房检查，令居民商人一体知照查验，并对巡警执法进行监督。商会招募了 500 名防疫队，应募者达 1 万余人，入选之人皆身体强壮，粗通文理和有确实铺保者。内有官弁 12 名，队长 40 名，均由巡警教练所毕业生派充，成立后分隶八区，「各专责成，以补官力之所不及」。不久由于各商伙渐有传染，商会又在大北门外及小东门设立商务病院两处，专门收容来自商家病人。由于两座隔离病院都设在庙宇之内，无法将罹疫之人同疫者有过接触者进行隔离。人们混居在一起，不受限制地随意走动，再加上治疗手段是传统大夫擅长的针灸和放血，没有采取任何现代消毒法，几天内两所隔离医院中的一所死亡 160 人，另一所死亡 50 人，致使当局紧急将两所医院关闭，并解散了商会招募的 500 名防疫队。〈防疫之慎重〉、〈搜疫队应募之踊跃〉、〈防疫队改期挑选之原因〉，《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9 日、2 月 28 日、3 月 2 日。

72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r.10,1911; 〈裁撤商立病院〉、〈公主岭防疫近情〉、〈防疫风潮之起落〉，《盛京时报》1911 年 3 月 2 日、3 月 1 日、3 月 2 日；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12

各城镇交通禁绝之后，农产品无法进城销售，导致百物腾贵，普通民众相对城市上层，则是受强制性检疫、防疫影响最大的群体。例如，1911年2月中旬，锦州市里各商铺住户所用薪柴，无不仰给于农人，入城通道由警士阻断之后，秫秸车辆进城售卖者日渐稀少，「秫秸价值遂较前涨价增半」。<sup>73</sup>再以各地娱乐业、服务性（妓馆、茶馆、餐馆、戏园、小客栈）或严格限制经营，或勒令关门停业，官府只给予一些象征性的补助。<sup>74</sup>作为连锁反应，人力车夫、马车夫也因市面萧条，坐客稀少而无所事事。他们平日无隔宿之粮，此时又不能出外挣钱，大有坐以待毙之势。尤其是官府进行卫生消毒，增加了其运营成本，使之叫苦不迭。如长春防疫局命令车夫，必须身着白布罩衣，「所用车垫车围均以白布围之，由局中制备完善，交由警局飭令，该车夫交价领取」。<sup>75</sup>鉴于此，普通民众中最常见的是弱者的反抗，即通过撒谎、欺骗、造假和装傻而进行抵制。在场西方新闻记者经常报道：由于担心家人被发现罹染疫病，以及自己被作为密切接触者而被强行送进隔离营，他们将患者的尸体藏在厚厚的雪堆下，或大水沟和深坑里。每一巷口都有孩子充当哨兵，当看到检疫官员沿着街道巡逻过来，他们立即发出信号，所有的病人，不论是能够勉强行动，或不能行动的，都被家人藏在大衣柜里，或院里的柴草垛中，直到警察和检疫人员离去。<sup>76</sup>

在此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普通民众与国家之间自然不乏正面冲突乃至暴力反抗，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有反抗官府独断专行的，如昌图行政当局准备在东西街民户聚集之处，分设隔离所，人民恐致传染而群起抗阻，遂迫使官府将之改设于城外空地，用木板、洋铁瓦建筑。「人民谓此房屋，即不病死，亦将冻死，十八日又聚集三五百人起而阻挠，刘守急派巡警赶往，始遂行解散。」另有反抗官府执法粗暴的，如吉林防疫局派员赴城西关黄旗屯添设分卡，并拟挨户检查，「乃该屯人民因素闻防疫队藉势凌人，受其辖者，几致不堪困苦，爰是反对甚力，竟至用武，该员遂狼狈而回」。还有反抗官府执法简单的，如奉天大西关贫民收容所有贫民侯某晚间因感冒风寒，经该所医官李、于二人检验，认为是疑似时疫，须送隔离病院调养，周围之人均不以送往病院为然，共计200余人，各持锹镐等件，「冲入医官住室二次，势甚凶烈，拟将该医官置之死地而后已。嗣经该所委员黄某极力排阻，并一面令该医官等改装易服，送出所外，警局闻电派警前往，事遂平息」。又有反抗官府强行介入的，如奉天一些屯将村落封锁，自行组织检疫、防疫，「即巡警欲入村调查，该村亦即禁止，谓他人能带来鼠疫，何巡警独不能带疫」。<sup>77</sup>

#### 四、结论

当一种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爆发后，民众本来就充满恐惧和惊慌，骤然采取强制性检疫、防

73 〈柴薪匮乏之原因〉、〈秫秸价昂〉、〈柴草昂贵〉、〈秫秸价涨〉、〈布价提昂〉，《盛京时报》1911年2月14日、2月17日、2月25日、3月5日、3月21日。

74 〈妓馆已不支矣〉，《盛京时报》1911年2月25日；再如奉天戏园被禁止演出之后，梨园弟子的生活出现了困难，最初官府每日补助五十吊钱，「孰知日复一日，疫症无了期，而防疫经费日形支绌，元宵后闻每日所给者仅二十吊」。各妓馆休业阅月之后，每日饭食万难节省，「现在已有不支持之势」。〈梨园子弟之困难〉，《盛京时报》1911年2月25日。

75 〈警局飭车夫缴价领衣〉，《盛京时报》1911年2月20日。

76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Feb.24,1911.

77 〈人民阻挠防疫之情形〉、〈人民反对防疫之无谓〉、〈收容所贫民之暴动〉、〈乡民之固执〉，《盛京时报》1911年2月19日、3月5日、3月12日、3月19日。最具暴力性的反抗是1911年1月5日，由于哈尔滨俄国市政当局展开检疫、防疫，将3000余名华人苦力强行驱逐出境，其中一部分人渡过松花江抵达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呼兰县城。后来疫情传至该城，最初两天染疫身亡人数就高达160-170人，为防止疫病进一步蔓延，当局强迫这些新抵达的苦力居住城外。1911年1月28日，苦力们在当地著名马贼大头目名天龙者的煽动之下，与大约200名马贼共举暴动，拥入城内，大肆抢掠，袭击衙门，焚烧房屋，合城官员以变起仓促，狼狈出逃，知府某仅以身免。当时的新闻报道说：该处的巡警防队皆无能为力，驻扎在长春的陆军第三镇接此急报之后，即派四中队当时午后由宽城子驿出发，并与东清铁路交涉开行临时快车。2月1日，长春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贼势猖獗，迅速取胜不易，「闻刻下尚未解围，俄人亦有起而干涉之意」。请参见〈呼兰府大暴动之警传〉，请参见《时报》1911年2月18日。

疫措施，这在任何社会都可能引发冲突和骚动。<sup>78</sup> 然而，此次东北检疫、防疫的特殊性在于这些冲突和骚动，除以往学者较多关注的医生/病患、科学知识/传统习俗、国家/社会，乃至殖民者/被殖民者间的纠缠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扩张、中国国族主义情绪高涨，以及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又一面相。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随着近代国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主权正为其时朝野上下最为关注，并催发了各地声势浩大的争取路权、利权、矿权的政治运动。<sup>79</sup> 同样，中国国族主义情绪在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不断走高，几成为比疫情更让人关注的话题。在俄国势力范围的北满，1911年2月初，当俄国检疫、防疫人员开枪击毙2名试图从隔离营潜逃之华人；焚毁染疫房屋时没有认真检查，将屋内3名华人烧死；以及东清铁路出售火车票，明文规定华人较外人降一等买票，并将货车改装为专载华人旅客列车，车中污秽臭恶及空气闭塞；舆论惊呼：「华人生命可谓不值一钱矣」；「外人直以奴隶视我，以牛马待我」。<sup>80</sup> 在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1911年1月初，当长春日本警署藉口防疫，将铁路附近华人任意驱逐，中国巡警亦不准近前保卫安奉铁路，时论报道说：「巡警总办廖令楚材以我国人民居我之土地，而竟任日人如此凌侮，且不许我巡警保护，实侵害我主权。昨已呈请交涉司，与日人交涉，若不能保全主权，决意告退云」。<sup>81</sup>

鉴于此次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除外交交涉和协商之外，还体现在国家权力向下伸展和在地方基层的具体运作，因而还需从普通民众的经历和感受反思其实际影响。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已经表明：主权作为国家机器，还将高压统治和顺从，强制和义务合二为一，即韦伯所说的「暴力垄断」(Monopoly of violence)。<sup>82</sup> 再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自法国大革命强调天赋人权，主权随之具有了生物学的意义，并通过负责健康的医生对个人身体进行控制(policing the body)，现代国家的权力遂像毛细血管一样，弥散在社会各个层面。<sup>83</sup> 本文或可补充的是：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创建，或启蒙时代的法国现代性的发展，此次在东北中国国家主权的实际建构和具体运作，直接受到反侵略国族主义理念的推动，虽说在旧体制之下民众被粗暴对待已被时人注意，但在捍卫主权、防止日、俄军事干预的思维框架下，政治和文化精英强调具有总体意义的抽象国族利益，强制性检疫、防疫过程中的种种粗暴和蛮横，

---

78 如十九世纪中期英格兰政府首次大规模推行公共卫生措施，1892年俄国的「霍乱骚动」(Cholera Riots)，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时华人的反抗，以及1897年印度鼠疫流行时，印度民众对殖民当局防疫措施的抵制。请参见 Jeanne L. Brand, *Doctors and the State: 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Health, 1870-191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5, p.7;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 pp.159-166;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140-147;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201-299.

79 时人写道：「外人为我练兵剿匪，操持兵权；中国讼狱，外人得而会审之，中国有罪犯，外人得而惩罚之；是操我之法权也，海湾者，为一国文明野蛮贫富强弱之关键，公法离海岸三十里以内则为领海，凡船舶入其领航者，惟其国之号令是听，其慎重海疆为何如乎！乃中国沿海要隘，莫不为外人所占据，长江天堑，莫不为外人所圈定，是操我江海之权也，于是中国失江海权。矿山者，一国之财源也，凡货币器用悉于是赖焉；关税者，岁入之大宗也，凡国中度支于是取焉。乃中国有矿山，外人得而开采之，中国有关税，外人得而抵押之，是操我财政之权也，于是中国失财政权。铁路者，为一国交通之枢纽，凡载运师旅，输送粮械，搬运货物，利济商旅，悉赖于是。中国之铁路悉为外人所有，是操我交通之权」。原载《国民报》第2、3、4期，1901年6月10日、7月10日、8月10日出版，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卷1，册上，页80。

80 〈北方防疫汇纪〉、〈北方防疫汇纪〉，《申报》1911年2月16日、3月1日。

81 〈北方鼠疫记〉，《时报》1911年1月19日；同样事件还有，当吉林日本警察署准备对华人屠宰场进行检疫，以及1911年3月初，日本警察署谓不必知照中国官府，将在奉天一带调查户口，中国报纸则以〈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主权未便干预〉为题进行报道。请参见《申报》1911年1月26日、2月25日。

82 James J Sheeha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Europe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6, p.6.

83 相关研究请参见 Fred Dallmayr ad Jose M. Rosales, eds., *Beyond Nationalism?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被赋予了不得已的政治正当性。<sup>84</sup> 用锡良的话说：隔离、消毒既于民情不便，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不能自保，交通久断则商务失败，人心扰乱则交涉横生，貽祸何堪设想」。<sup>85</sup>

作为普遍自然法则，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道传染的鼠疫，在人群中蔓延不受种族、领土、国界和文化的限制，主权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身份的政治标识，在人类经受这样一种巨大灾难时可能只具有有限意义。虽说主权之争贯穿始终、反抗的国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但此次检疫、防疫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合作。由于中国政府能力有限，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检疫、防疫，及医疗救助不得不由外国医生全权负责，不少华人病患还得到了包括日、俄市政当局程度不一的救助。<sup>86</sup> 至 1911 年 4 月，疫情最为严重的傅家甸有六个国家的 50 余名外国医生，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医生，其中有些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sup>87</sup> 需要一提的是，此次疫情扑灭之后，这种跨国合作模式被随即成立的东北防疫处承袭。作为直属北京外务部的检疫、防疫机构，东北防疫处的设立体现了中国国家的主权，成立之初特意雇佣一批来自列强的外国专家，并以外人主持财政，旨在避免当时中国官场病入膏肓的贪污和浪费。该机构四位主要负责人也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英文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受到国际同行的尊敬，并有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就实际效果来看，自 1912 年之后，随着俄国在满洲的影响日渐减少，该机构在其后几次爆发鼠疫、霍乱时已能向俄国哈尔滨市政当局提供资讯和医学帮助，并能平等地与日本就防疫、检疫进行协商合作。用美国学者内森的话说，1910—1911 年鼠疫蔓延过程中，驻哈尔滨的美国领事曾发回不少充满忧虑的报告，此后满洲再遭疫情肆虐时则几乎没有表示，原因就在于东北的检疫、防疫已经相当专业化、国际化。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东北，并提出很多出兵理由，「却无法再将传染病蔓延作为指责中国政府无能的借口」。<sup>88</sup> 在这个意义上，防疫、检疫过程中的跨国乃至全球合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

84 例如《时报》的一篇文字称：1910 年秋，上海曾经发现少量鼠疫案例，外人因检疫之故，几至大起风潮，「今若北疫南行，则凡通商各口岸及外人有租界之处，必将严其检疫之法，华人视疫付之天数，不知较水火刀兵为尤危，一经查问，易起反抗，其足以生风潮惹暴乱，涉及国际问题者又意中事也」。请参见〈论鼠疫南行关系之巨〉，《时报》1911 年 2 月 9 日。

85 〈东三省疫气一律扑灭在事尤为出力人员请奖折〉（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册 2，页 1311。

86 如法库门检疫、防疫就由日本医生森田博士（Dr.Morita）全权主持。疫情爆发之时他还在日本，当收到中国方面加急电报邀请后，他毫不犹豫来到法库门，提出的要求是须给予全权，否则就立即离开。中国方面答应了他的要求。实际上，即使在主权意义极重要的哈尔滨，伍连德抵达后也紧急约见了俄国东清铁路总办、医官、哈尔滨俄国市政防疫事务官员和东清铁路医院负责人和各国领事，请求支持和帮助。美国领事 Mr. Roger S. Greene 给予了较多鼓励，伍连德后来回忆道：「他很感谢这样的信任和鼓励，尤其是美国领事承诺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可随时与之面谈。」此外，俄国东清铁路公司提供了包括隔离车厢在内的一些物资援助。请参见“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 1911;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pp.15-16.

87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16.

88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p.64, 77.

## 徵引书目

### 一、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兵部—陆军部档案，索卷号 531—15—3，案卷号第 285 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缩微胶片第 109 卷，第 584 号。

### 二、报纸期刊

《东方杂志》第七年，期 11、12、卷 8 号 8。

《申报》1911 年 1 月 19 日、21 日、24 日、26 日、2 月 3 日、5 日、10 日、14 日、16 日、18 日、19 日、21 日、25 日、3 月 1 日。

《时报》1911 年 1 月 18 日、19 日、2 月 2 日、2 月 4 日、10 日、17 日、18 日、20 日、22 日、3 月 9 日、27 日。

《顺天时报》1911 年 1 月 25 日、2 月 25 日、8 月 25 日。

《盛京时报》1906 年 12 月 7 日、1907 年 2 月 8 日、9 月 22 日、10 月 3 日、11 日、12 月 4 日、10 日、24 日、1911 年 1 月 13 日、19 日、20 日、21 日、24 日、26 日、27 日、28 日、29 日、2 月 9 日、11 日、14 日、15 日、16 日、17 日、18 日、19 日、20 日、23 日、24 日、25 日、28 日、3 月 2 日、3 日、4 日、5 日、14 日、15 日、19 日、21 日、22 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1894,, Jan..27.1911, Feb.17,1911, Feb.24,1911,Mar.,10,1911, 17.1911.

### 三、专书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册 2。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911 年 12 月刊印， 编 2。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卷 1，册上。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東京：研文出版社，2000 年。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arl F. Nathan, *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1910-1931*,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East Asian Historical Monograph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red Dallmayr ad Jose M. Rosales, eds., *Beyond Nationalism?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Inglis Christie,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 the Story of a Life with a Purpose*, by his wife ; with forward by Sao-Ke Alfred Sze, London : James Clarke & Company, Ltd.,1932.

Jeanne L. Brand, *Doctors and the State: 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Health,1870-191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5.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W. Heffer & Sons LTD, Cambridge, 1959.

### 四、论文

胡成：〈东华故事与香港历史的书写〉，《读书》，2003 年第 6 期。

Ch'uan Shao Ching Dr.,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Plague in Manchouli",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Session II, April 1911, Manila*, p. 29.

Dr. Bogucki, "The Plague Epidemic at Harb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Manila, 1912, pp.201-202.

Dr. Iasibeski, "Data Relation to the Origins of Infection of Towns and Villages,"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Manila, 1912, p p. 217-218, p.38.

James J Sheehan,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Europe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6, p.6.

Mark Gamsa, "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911," *Past & Present*, Number 190, February, 2006, pp.148-185.

Sean Hisang-Lin LEI, *Sovereignty and the Microscope: Constitution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 Plague*(待刊稿).

收稿日期: 2007-9-9

作者简介: 胡成, 男,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